

愛沙尼亞的漢學、印度學與藏學研究：歷史及現況

Chinese, India and Tibetan Studies in Estonia: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e

Linnart Mäll* 著

張琰 (Chang Yen) ** 譯

在愛沙尼亞 (Estonia)，以現代學術意義而言的人文學科，其歷史開始於 1632 年，當時瑞典國王 Gustavus II Adolphus 在塔圖 (Tartu) 成立一所大學。為紀念國王而命名為 Academia Gustaviana 的塔圖大學，是東歐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愛沙尼亞的東方學歷史也要回溯到 Academia Gustaviana 時期。就我們所知，在該校初期的 17 世紀只有閃族語文的教授，屬於基督教神學的課程。漢學和印度學遲至 18 世紀才在歐洲演變成獨立的學科，藏學研究就更晚了。愛沙尼亞的學者在 19 世紀中葉才開始專門研究這些領域。這所大學在中斷了幾乎一百年後於 1802 年重新開放，而改名為「塔圖俄羅斯帝國大學」。

1837 年可以視為愛沙尼亞印度學的起始點。這一年，Karl Friedrich Keil (1807-1888) 教授開始在塔圖大學教授梵文。1865 年，設置「比較語言學與梵文」講座，著名的德國語言學家及梵文學者 Leo Meyer (1830-1910) 受邀擔任該講座教授，嗣後留任該校三十多年。1898 年，俄國教授 Dmitri Kudryavski (1867-1920) 取代了他的位置。Kudryavski 教授以俄文出版一本梵文教科書，並出版了關於古代印度文和一般語言學及古代印度文化的研究。

附帶一提，幾乎整個 19 世紀，塔圖大學授課的語言都是德語，因為一直到 19 世紀末，愛沙尼亞受過教育的上層階級主要都還是德國人。愛沙尼亞語在當時仍然在成形為文化及教育的語言的階段。作為一個以德語

為主的的教育機構，塔圖大學透過與國際的密切關係，融入歐洲大學，尤其是德國的大學網。19 世紀末，帝俄教育政策中的俄國化浪潮將德語逐出了大學校園。這件事對於印度學也有影響——德籍教授被一位俄籍教授所取代。直到 1918 年，愛沙尼亞在俄國共產黨革命後宣布獨立成為共和國，塔圖大學才成為以愛沙尼亞語教學的國立大學。

19 世紀在塔圖大學研讀並且教學最知名的印度學學者是 Leopold von Schroeder (1851-1920)，他是當地的波羅的海區裔德國人，自 1877 年工作至 1894 年，先是擔任「私人教師」(privat-docent)，後擔任古印度語言與文學的專任副教授。在俄國化的壓力下，他離開塔圖到奧地利，在因斯布魯克及維也納的大學中擔任教授，直至去世。他也是「維也納科學院」的成員，其最重要的印度學作品有內容豐富的《印度文學與文化之歷史發展》(萊比錫，1887 年)，該著作係根據他在塔圖大學授課的講義寫成。他還出版了彌多羅尼本集的梵文本。

另一位愛沙尼亞的波羅的海區裔德國人 Alexander Stael von Holstein (1877-1936)，是在塔圖大學開始研究梵文。他是一位傑出的印度學學者和佛學專家，自 1916 年起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工作。他曾經擔任過北京和哈佛等大學的教授，也是「中印協會」的創立人之一，並曾擔任該會主任。為紀念他的一百一十歲冥誕，塔圖大學在 1987 年在他的出生地 Tõstamaa (位於愛沙尼亞西南部的 Pärnu 郡) 舉行了一場會議，在該次會議

* 作者係愛沙尼亞塔圖大學東方學中心主任及高級研究員，於民國 91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6 日由國科會資助至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訪問，本篇為其演講稿。

** 譯者為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

中，與會的愛沙尼亞及俄國印度學學者與當地政要聯合為他的紀念碑揭幕。

19 世紀最後 25 年中在塔圖大學發展而成為頗有影響力的印度學和梵文研究學派，由於俄國化及其後的一次世界大戰（愛沙尼亞間接受到波及）與俄國革命，而不幸喪失了之前的活力，在愛沙尼亞國立塔圖大學內再也沒有回復到之前的盛況。不過它在更廣的層面上卻對印度學的發展有更大的貢獻。有幾位之前曾就讀於塔圖大學的印度學學者，日後在別處成為知名的學者和教授。這些人有（除了已經提過的幾位）：俄國梵文研究的創始者 Robert Lenz（1808-1836）、基輔大學梵文及比較語言學教授 Matthäus Friedrich Knauer（1849-1917）、吉森（Giessen）大學教授 Peter von Bradke（1853-1897）。

雖然在 19、20 世紀交會時塔圖大學的梵語和古印度文學資料的研究達到相當高的科學水準，但是這時漢學卻才剛出現在愛沙尼亞。19 世紀的塔圖大學並沒有中文和其他東亞語文的學科。在上個世紀最後十年中第一個能夠發表關於中國和滿州語文的論文及演講的漢學家（大多是自學而成的），是 Karl August Hermann（1851-1909），他是愛沙尼亞語講師，他本人也具有愛沙尼亞的背景。他最喜歡的主題是愛沙尼亞語與其他芬蘭-烏戈爾（Finno-Ugric）語言和中文的比較。他認為從幾個共同特徵來看，中文和芬蘭-烏戈爾及烏拉爾-阿爾泰（Uralic-Altaic）諸語言是有關聯的。雖然 Karl August Hermann 的結論不符合現代標準，但是他在愛沙尼亞漢學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在於他是塔圖大學第一個熟諳中文而可以用比較方法研究中文，並且不只是以德文、也以愛沙尼亞文將之出版的愛沙尼亞籍學者。

不過，成為揚名國際的漢學家的，卻是原本在塔圖大學學習科學和醫學的 Alexander Hermann Emil Bretschneider（1833-1901）。他在 1866 到 1883 年間擔任俄國駐北京使館醫生時，透徹研究了中國及其文化典籍，而以中國與其他國家在歷史上的關係為重點。他以德文和英文出版了數十本漢學著作。在這裡我們也應該將之前提及的 Alexander Stael von Holstein 算在內，他也是具塔圖大學背景的漢學家，研究的是中文佛教經典，以及中國古物與藝術。

愛沙尼亞獨立後於 1918 年重新開放的愛沙尼亞國立塔圖大學，其主要目標是發展與重建科學及高等教育的愛沙尼亞語文體系。東方學——包括印度學及漢學

——在這最初階段並非最迫切的要務，因為愛沙尼亞的科學和人文學科面臨更迫切且實際的任務。合格的專家在當時已經所剩無幾，而愛沙尼亞語的術語與概念體系幾乎可說是不存在的。東方學學者的派別在 1930 年代後半才開始形成，但是東方學的各學門，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卻無一能達到塔圖帝國大學時的水準。

德國教授 Friedrich Ernst Kieckers（1882-1938）將塔圖大學梵文研究與比較語言學的傳統維持並傳遞了近二十年之久。他從 1921 年起便到該校工作，直至辭世為止。他的學術活動以講學為主，學術貢獻較不顯著。他的學生 Peeter Arumaa（1900-1982）在戰前最後的歲月中繼承他的工作。

Kieckers 教授是位學養豐富的學者，對於許多東方語言有深厚的了解，包括中文。因此他對於愛沙尼亞的漢學也有貢獻。我們知道他在 1930 年代中期開過一門中國文言文的課程，內容以分析《孟子》一書為主。

第一位學養俱優的愛沙尼亞漢學家是 Leo Leesment（1902-1986），他的專長是法律，曾在巴黎所邦大學學習中文。1930 年代他在塔圖大學教授中國法律、語言及歷史，也曾發表關於中國歷史的論文。Leo Leesment 是第一位直接將中文作品譯為愛沙尼亞文的譯者，該書為明代佚名作者所寫的《賣油郎獨占花魁女》（1959 年出版）。

除學者之外，譯者和作家對於 20 世紀前半期愛沙尼亞的漢學也有貢獻。《孟子》和《老子》經由歐洲語言轉譯到達愛沙尼亞的讀者手中。最負盛名的愛沙尼亞小說家 Anton Hansen-Tammsaare（1878-1940）在 1938 年發表一篇關於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精彩長文，題為〈中國與中國人〉，作為入門的資料，這篇文章迄今仍然能夠被學習中國文化和歷史的人使用（這篇文章重新刊載於作者 1990 年出版的作者合集中）。

「愛沙尼亞東方學會」（Estonian Oriental Society）於 1935 年成立，是愛沙尼亞全國東方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時刻。學會的發起人是之前曾提及的 Leo Leesment。該學會是由塔圖大學的師生負責運作，學會主要的工作是舉行會議，提出論文，論文多以中國和日本為主題。學會備妥一系列的學報，原擬以 *Scripta Academiae Societatis Orientalis* 之名出版，但此工作卻在 1940 年因蘇聯佔領及次年蔓延到愛沙尼亞的二次世界大戰而中斷，該會的活動便告終止。「愛沙尼亞東方學

會」在 1940 年有 29 名會員，其中幾位學者在戰後愛沙尼亞東方學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多才多藝的神學家及哲學家 Uku Masing (1909-1985)、語言學家 Pent Nurmekund (1906-1996) 和 Villem Ernits (1891-1982)，以及歷史學家 Jaan Konks (1902-1988)。

開始於 1940 年並持續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直到 1991 年的俄國佔領，對於整個愛沙尼亞文化與人文造成慘重的影響，東方學也包括在內。許多不見容於共黨政權的自由派學者及知識分子，不是被捕就是被害；有許多人則在戰後逃亡出國。留在愛沙尼亞的，則必須忍受在其專業工作上各種各樣的阻撓。印度學及漢學的發展因此停頓近二十年。

最先恢復在塔圖大學（在蘇聯統治期間更名為塔圖邦大學）等處東方語言及東方學教學的，是知名的多國語言專家及語言學者 Pent Nurmekund。從蘇聯監獄釋放出來，並在國內流放數年後，他重返大學教職。具有卓越語言能力的他，在幾所歐洲大學的「學術漂流」歲月中，學習了中文及其他東方語言。1956 年，他在塔圖大學成立一個研究東方學的團體，並在其中開始教授東方語言，作為選修科目。之後，他的學生和學生的學生也加入這個團體。

Nurmekund 本人除了許多歐洲和非洲語言之外，也能夠教授中文、日文、印度文、烏爾都文 (Urdu)、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東方語文。他也和蘇聯最重要的東方學中心接觸，這是能夠與國際學術接觸的唯一方法，因為人文學者按例是不准出國的，除非他們有共黨和國安局的支持。無論如何，東方學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這兩個大都會維持住其高標準。赫魯雪夫當政時期某些自由化作風對於東方學也有些良好的影響。因此在 1960 到 1970 年代間和俄國學者再次的接觸，對於愛沙尼亞的東方學學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自彼時起，我本人也參與了愛沙尼亞東方學的發展，詳細說是印度學、漢學、藏學，以及遍及並連接這些學科的佛學研究。這使我可以從一個個人的角度觀察，此刻我願意將之與各位分享。

自從 19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以修習歷史的背景從塔圖大學畢業後，我對於東方歷史，尤其是佛教日益感到興趣。拜 Nikolai Konrad (1891-1970) 這位傑出的俄國歷史學者、漢學家及日本專家之賜，我得以在莫斯科東方研究院繼續我的研究，並能親炙當時在該處工作的

最知名的學者們。其實我對佛教有比較深的興趣還在更早之時，激發我的是最了不起的愛沙尼亞學者之一，前述的 Uku Masing，在他幾乎是被軟禁在塔圖家中的那段歲月中，我和他有密切的交往，那時候他根本沒有機會出版著作或是講課。

1960 年代中期，我加入當時正在成形的塔圖-莫斯科符號學派。學派領導人之一是塔圖大學俄籍的文學及文化史教授 Yuri Lotman (1922-1993)。學派中還有幾位傑出的東方學學者，例如印度學學者及佛學學者 Alexander Piatigorsky。這個學派係由兩座城市為名，因為加入的學者全來自這兩地。

發展新觀念和方法，是塔圖符號學暑期班的傳統，這個傳統從 1964 年開始，日後馳名全世界。暑期班中絕對無視於馬克思主義的存在，討論也都集中在符號、典籍、文化、精神領域、象徵領域等基本的概念上。共產當局自然知道這整件事在意識型態上並不正確，但是一方面因為愛沙尼亞政府比較寬容，另一方面是因為符號學術語的複雜，所以當局並未干預，直到 70 年代中期。最後一次的暑期班是在 1986 年開課。

塔圖-莫斯科學派的術語相當複雜，理由之一自然是不希望當局看出其中的道理，但是更重要的理由是要研究出一種準確的敘述、一套恰當的後設術語，而可以以最大的正確性傳達佛教觀念，避免引用基督教和西方哲學的觀念及術語。

我們可由以傳布所謂的佛陀真正信息來評估佛教經典，作為討論起點。與當時佛學學者常見的欲找出最初的佛教、恢復「原始佛典」的企圖相反，我們的前提是認為這基本上是個不可能的工作，更是不必要的工作，因為不符佛教中廣為人知的事實，即教誨不是僵化的教條，而是細分為具體的經典（信息），在當時給予特定的一些人。因為典籍的寫定在第一位典籍的「產生者」（釋迦牟尼佛）去世後好幾世紀才有，之前是一段漫長的口述傳統，所以完全不可能得知佛陀是只傳了一部「原始佛典」，或是有好幾部。今天所有的文字確定的佛教經典，都可以平等地被視為產生類似意識狀態的機制，這些機制在不同的文化內容中運作。

在這裡我們面對了佛教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dharma*（法），這是好幾代佛教學者煞費苦心想要闡明的概念。他們相當同意「法」是個模糊的名詞，其意義範圍可以包括佛的教誨、一種意識狀態、存在的元素，

或是一種現象。

然而，從符號學觀點來看，這並不是一個解答。如果一個名詞顯然在某種文化內容中具有某種意義，但卻無法清晰而不模糊地被解釋，也就是說無法找到恰當的語辭去翻譯它，那麼可能的原因是：在我們的文化中從來沒有一個字符符合梵文中的「法」。不過還有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有這麼一個字，但是卻沒有這樣的文化內容，讓這個字變成一個術語。而我們塔圖-莫斯科學派研究的結果，相信此文化內容已經建立起來，如今有一個名詞在此內容中具有類似「法」在佛教經典中的作用。這個詞就是 *text*。佛教的示教是 *text*，它可以是書寫形式或是言說，或是內心獨白或甚至是手勢、面部表情，或任何自然之物。但是一個現象本身並不是 *text*，例如，一本書只有在有人閱讀時才會變成一個 *text*。

例如，重要的佛教典籍《八千頌般若經》就仔細探究了經常閱讀、傳布、誦唸、抄寫的「經」和埋藏在 *stūpa*（舍利塔）中的「經」二者間的差別，最後它認為前者是「活經」（*dharmakāya*），而後者卻是「死經」（*dharmasārīra*）。

然而，*text* 卻不能當成某種被限定的現象去了解。「法」（*Dharma*）（*text*）（既是佛經的全部也是個別的部分，例如「一部經書」。但是 *text*（或者說 *dharmā*）也是所謂的各種「法」（例如 *rūpa* 或「色」）中的一個字，而就廣義的觀點來看，它是在一部「大經典」中代表重要概念的每一個字。

之前我說過，比方說，一本書只有在被賦予一種意義，也就是當有一種意識作用於其上時，才會成為 *text*。*text* 總是和一種意識相連。所以了解 *text* 也總是指達到某種意識狀態。了解的過程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創造 *text* 的過程，因此，一種意識狀態也可以被視為一種 *text*。於是我們得到這個結論：佛教的「法」觀念在各方面都相當於 *text* 這個字——或者，和前述內容一致的說法是，相當於“*text*”這個 *text*。

以上的解釋也可以用來解釋佛教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即是 *sūnyatā*「空」。這個字在一般語言中是「空虛」之意，而佛教學者卻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因為有不同解釋的關係，佛教被看成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及許多其他的東西。在符號學的解釋中，*sūnyatā* 確實是有「空」、「無」的意思，但是卻不是沒有任何東西，而是有無窮的可能性。因此，*sarva-dharma-*

sūnyatā（「諸法皆空」）這重要的佛法並不是意謂「沒有任何現象」，而是「（詮釋）所有 *text* 的無限可能性」，或者「一切 *texts* 的開放性」。

以上的例子應該已經足夠了，我且用以下結論作一個結束：運用符號學在佛學研究中，不僅給我們機會去避開蘇維埃偽科學，也顯現了佛教之前被忽略的一些方面。

由於這些因素，我們可以提到在 1960 年代末期愛沙尼亞東方學（更確切的說，是塔圖東方學）的復興，其中最主要的是印度學、漢學，以及西藏研究。不過，這並未促使塔圖大學成立一個單獨的東方學學院（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成立）。東方學主要隸屬歷史學院（過去十年隸屬哲學學院內的歷史系）。接下來，我想要簡短的就過去三十年間在這三種領域中主要的研究方向及成果作一番評論。

1973 年，因為反共觀點及我的佛學老師布里亞喇嘛 Bidiya Dandaron（1914-1974）的被控，我被解除在歷史系的教職，之後 Dandaron 被判再次入獄，之前他已因佛教活動服過漫長的刑期。他於一年後過世，他所有的同僚都受到打壓，並被解除學者及大學講師的職位。不過我仍然能在工程師的職位上繼續我的研究工作，但是在將近十年的時間，政府不准我在大學講課，以免在意識型態上「腐化」了學生。

在我「被迫沉默」的歲月中，我致力於翻譯工作，將書籍譯為愛沙尼亞文，並且出版許多印度及中國古典典籍。專事《大乘經》《八千頌般若經》及其他佛教經典的翻譯，我的作品多半發表於《塔圖州大學會報系列》、《符號學作品》以及《東方學》選集。我也是《東方學》系列的編輯之一。

在東方學的團體中，梵文、藏文、文言中文和現代中文、印度文、土耳其文和日文及其他語言的選修課程都有開班。雖然官方禁止我講課，但卻准許我教授語言課程，並且能夠有某種程度的指導學生研究論文。這使我可以和學生交流，因而創造出在後十年中形成一個學派的先決條件。我也繼續以參加會議和共同發表論文的方式與俄國的東方學者密切合作。

1972 年，我組織一支遠征隊伍，前往布里亞（Bur-yatia）去拯救那兒岌岌可危的珍貴藏佛手稿、版畫和唐卡（*thankas*）。該次遠征隊蒐集到的古文物，已收藏在 19 世紀就已成立的塔圖大學圖書館手稿及善本書部門的西藏收藏品內。我的學生 Maie Kark 女士以英文編

纂了一份西藏手稿目錄。塔圖大學圖書館的西藏收藏品包括三百件以上的西藏手稿及木版經典，以及數十幅唐卡。這些遠征隊及典籍目錄的編纂可以視為愛沙尼亞科學方式的西藏研究的開始，因為在這個領域，早先的工作或研究的資料是付之闕如的。

在 1980 年代，意識型態的壓力略有減緩，我可以重回大學講課，並被任命為歷史與符號學實驗室主任，此實驗室係在 Yuri Lotman 之倡議下成立，也包括了東方學研究部門。遲至 1985 年，我才終於被准許在莫斯科東方學研究所參加博士學位口試。〈*Ash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作為一種史料〉已經寫就十二年，一直在靜候機會，而我也終於得到我的歷史博士學位。1988 年，在「改革」氣氛最高漲之際，愛沙尼亞東方學會也恢復運作，而在愛沙尼亞的東方學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1994 年 5 月，第二屆「北歐波羅的海區東方學大會」在塔圖舉行。大會主題是「古典東方經典的詮釋藝術」，大會由愛沙尼亞東方學會主辦，哥本哈根「波羅的海區亞洲研究院」（NIAS）協辦。

愛沙尼亞重獲獨立後，塔圖大學在 1990 年代進行許多基本及結構性的改革，目的是有更大的開放空間，以及與西方的科學及教育體系結合。這對於東方學的發展也產生了有利的影響。這個領域的研究與教學，都由成立於 1994 年的東方學中心負責。目前本人擔任此中心的主任，而中心主要的研究範圍仍然是運用歷史符號學的方法，對於印度、中國及藏佛典籍與其他古經典做研究與翻譯。

不幸的是，愛沙尼亞至今仍是一個貧窮的國家，這也是我們無法組成一隻龐大的研究團隊的原因。不過我有幾位學生已經取得碩士學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我願意介紹我的兩位得意門生：一位是 Andres Herkel（1962 年生，1997 年獲碩士學位，其論文為「古印度經典中的神話心理學」）。他是國會議員，在政治上十分活躍，對於開拓與臺灣的關係具有良多的貢獻，而且他的研究也仍在持續；另一位是 Märt Läänemets（1962 年生，1999 年獲碩士學位，論文為「《論語》作為史料」）。

從 1998 年起，東方學中心的研究目標是在資助研究計畫「人類歷史中的人文基本經典」的架構下進行，目前的研究目標計畫的第一期（為時五年）將在 2002

年結束，我們計劃延續此工作，並尋求進一步的財力支援。不過我們希望未來能加強國際合作，邀請其他國家參與，尋找新的財源。

在塔圖大學及其他愛沙尼亞大學中，東方語言的教學正穩定增加中。1997 年，塔圖大學外語中心開授日文及土耳其文的課程，這些課程由東方學中心支持，經費則由各國機構提供。塔圖大學也很願意基於相同基礎成立中文中心。東方學中心有梵文及藏文的課程，偶爾也有文言中文及現代中文及文化史的課程。

達賴喇嘛於 1991 年及 2001 年來訪，以及將他的書籍譯為愛沙尼亞文，對於愛沙尼亞人對西藏文化與佛教日益增加的興趣有很大貢獻。不久前，2001 年秋天，「愛沙尼亞大乘學院」才以非政府組織方式成立，以提倡佛學教育及研究為目的，本人為理事會主席。「愛沙尼亞大乘學院」於 2002 年 2 月開始運作，對於與其他類似的佛學組織與學院的國際關係亦深感興趣。

以上是對於愛沙尼亞東方學發展及現況的簡短報告。我強調的是塔圖的部分，因為塔圖是愛沙尼亞的文化之都。順便一提，數個政府機構便設置在該地，例如教育部及愛沙尼亞最高法院。

Appendices

1. Selected bibliography on the subject

- Batchelor, Stephen. *The Awakening of the West: The Encounter of Buddhism and Western Culture*. Berkeley, California: Parallax Press, 1994, 416 pp.
- Belka, Luboš. Oriental and Buddhist Studies in Estonia. — *Archív Orientální*, No. 64, (1996), pp. 399-404.
- Belka, Luboš. Buddhismus v Estonsku [Buddhism in Estonia, in Czech]. — *Religio*, No. 4 (1, 1996), pp. 89-94.
- Hallik, Martin. *Tartu Ülikooli õppejõudude ja kasvandike osast humanitaarorientalistikas (1802-1940)* [About the role of the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Tartu in the *studia humaniora orientalia* (1802-1940), in Estonian with summary in English]. — *Dissertationes historiae Universitatis Tartuenss. 4*. Tartu: Tartu Ülikooli kirjastus [University of Tartu Press], 2001, 264 pp.
- Koval, A. N.: Vostokovedcheskaya tematika v "Trudah po znakovym sistemam" [Oriental Studies in the "Works on Semiotics," in Russian]. — *Moskovsko-*

- Tartuskaya semioticheskaya shkola. Istoriya, vospominaniya, razmyshleniya* [Moscow-Tartu School of Semiotics. History, Reminiscences, Reflections]. Ed. by S. Yu. Neklyudov. Moskva: Shkola "Yazyki russkoi kultury", 1998, pp. 341-378.
- Läänemets, Märt. Linnart Mäll ja Tartu Orientalistika [Linnart Mäll and the Tartu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in Estonian].—*Keel ja Kirjandu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5, 11, pp. 736-745.
- Mäll, Linnart. Leopold von Schroederi tegevusest Tartu Ülikoolis [On the Activities of Leopold von Schroeder in the University of Tartu, in Estonian].—*Tartu Ülikooli ajaloo küsimusi* [Papers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artu], Vol. I. Tartu, 1975, pp. 213-217.
- Mäll, Linnart. Semiotics as a Possibility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Texts in the Conditions of the Communist Dictatorship.—*The Academic Study of Religion During the Cold War. East and West.*—*Toronto Studies in Religion*, Vol. 27. 2001, pp. 163-170.
- Nurmekund, Pent. Kratkii ocherk istorii vostokovedeniya v Tartuskom universitete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Oriental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Tartu, in Russian with summaries in Estonian and German].—*Transactions of the Tartu State University*, Issue no. 201. Oriental Studies. Vol. I. Tartu, 1968, pp. 5-14.
- Nurmekund, Pent. Kitaevdenie v Tartuskom universitete [Sinological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Tartu, in Russian with summaries in Estonian and German].—*Transactions of the Tartu State University*, Issue no. 313. Oriental Studies. Vol. II, part 2. Tartu, 1973, pp. 478-495.
- Smirnov, S. V. Professor Tartuskogo (Yuryevskogo) universiteta D. N. Kudryavskii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Tartu (Yuryev) D. N. Kudryavski, in Russian].—*Transactions of the Tartu State University*, Issue no. 247. Trudy po russkoj i slavyanskoj filologii [Papers on the Russian and Slavic Philology], Vol. XVI. Tartu, 1970, pp. 3-171.
- II. Translations of Ancient Indian Texts into Estonian
Vetäla kakskümmend viis juttu (Vetälapañcavimsatikā) [Twenty Five Tales of Vetäla], 1969 (Linnart Mäll, Uku Masing)
Teemantsuutra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Diamond Sūtra], 1975 (Linnart Mäll)
Önneliku maa sutra (Sukhavatīvyūhasūtra) [Pure Land Sūtra], 1975 (Maret Kark)
Dhammapada, 1977 (Linnart Mäll)
Bhagavadgītā, 1980 (Linnart Mäll), corrected and enlarged edition, 2000.
Šāntideva, Bodhitšarjāvatāra (Šāntideva, Bodhicaryāvatāra), 1982 (Linnart Mäll)
Papagoi seitsekümmend juttu (Śukasaptati) [Seventy Tales of the Parrot], 1983 (Linnart Mäll)
Sūdasuutra (Prajñāpāramitā Hṛdaya Sūtra) [Heart Sūtra], 1989 (Linnart Mäll), reprint, 1998.
Nala lugu, VII-IX pt (Nalopākhyāna) [Nala's Song, chapters VII-IX], 1989 (Märt Läänemets)
Kāmasūtra, 1989-90 (Linnart Mäll)
Śālistambasūtra, 1994 (Andres Herkel)
Aitareyopanishad, 1996 (Andres Herkel)
- III.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Texts into Estonian
Õlimüüja ja lillehaldajas, Mingi ajastu novell [The Oil Vendor and the Flower Fairy, a Ming novellette], 1959 (Leo Leesment)
Daodejing, 1979 (Linnart Mäll)
Konfutsius, Vesteid ja vestlusi (Lunyu, Daxue, Zhongyong), 1988 (Linnart Mäll)
Zhuangzi (three first books), 1989 (Jaan Kaplinski)
Täiskuu taeva all (Under the Full Moon Sky: a selection of Tang poetry), 1985 (Jaan Kaplinski)
Li Bo's nine poems, 1996 (Märt Läänemets)
Sun Zi, Sun Bin, Sõja seadused (Sun Zi Bingfa, Sun Bin Bingfa), 2001 (Märt Läänemets)
- IV. Selected papers on Chinese, Indian and Tibetan Studies by Estonian Orientalists
 Linnart Mäll
Nulevoi put' [The Zero Way, in Russian]—*Trudy po znakovym sistemam [Works on Semiotics]*. Vol. 2.—*Acta et commentationes Universitatis Tartuensis*, Issue No. 181. Tartu, 1965, pp. 189-191.

- Ob odnom vozmozhnom podhode k ponimaniyu Shunyavada [On the One Possible Wa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 Russian]—*Terminologia Indica*, Vol 1. Tartu, 1967, pp. 13-24.
- Une approche possible du Śūnyavāda—*Tel Quel*, P. 32. Paris, 1968, pp. 54-62.
- K buddiiskoi personologii (bodhisattva v "Ashtasahasrike Pradzhyaparamite") [On the Buddhist Personology (Bodhisattva in the "Ash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 in Russian)].—*Trudy po znakovym sistemam* [Works on Semiotics]. Vol. 5.—*Acta et commentationes Universitatis Tartuensis*, Issue No. 284. Tartu, 1971, pp.124-132.
- Chetyre termina pradzhyaparamitskoi psihologii [Four Terms of the Psychology of the Prajñāpāramitā, in Russian]. Part 1.—*Oriental Studies*. Vol. 2. *Acta et commentationes Universitatis Tartuensis*. Issue No. 309. Tartu, 1973, pp. 202-213. Part 2.—*Oriental Studies*. Vol. 3.—*Acta et commentationes Universitatis Tartuensis*, Issue No. 392. Tartu, 1976, pp. 93-124.
- Nekotorye problemy vozniknoveniya mahayany [Some Crucial Problems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hāyanā, in Russian].—*Central'naya Aziya v kushanskuyu epokhu* [Central Asia in the Kushan Era], Vol. 2. Moskva: Nauka, 1975, pp. 219-222.
- Eshcho raz o Yamantake [Once More on Yamāntaka, in Russian].—*Oriental Studies*. Vol. 4.—*Acta et commentationes Universitatis Tartuensis*, Issue No. 455. Tartu, 1978, pp. 43-46.
- K ponimaniyu "Dao-De-Czina"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Daodejing"].—*Oriental Studies*. Vol. 6.—*Acta et commentationes Universitatis Tartuensis*, Issue No. 558. Tartu, 1981, pp. 115-126.
- Svetlyi i temnyi put' [The Bright and Dark Ways, in Russian].—*Trudy po znakovym sistemam* [Works on Semiotics]. Vol. XVI.—*Acta et commentationes Universitatis Tartuensis*, Issue No. 635. Tartu, 1983, pp. 106-114.
- Dialog v "Bodhicharyavatare" [Dialogue in the "Bodhicharyāvātāra" , in Russian]—*Trudy po znakovym sistemam* [Works on Semiotics]. Vol. 17.—*Acta et commentationes Universitatis Tartuensis*, Issue No. 641. Tartu, 1984, pp. 45-47.
- Buddiiskaya mifologiya [The Buddhist Mythology.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Russian]—*Mify narodov mira* [The Myths of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I-II. Moskva: Izdatel'stvo "Sovetskaya Enciklopediya" , 1982 (reprinted in 1992, 1994, 1997-98)
- Tülkekulg [The Way of the Translation, in Estonian] —*Poeetilise teksti tüpologia, tülke ja retseptisooni probleeme* [On the Problems of Typology,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Poetical Texts].—*Acta et commentationes Universitatis Tartuensis*, Issue No. 709. Tartu, 1985, pp. 43-60.
- Ispol'zovanie teksta kak sredstva psihicheskogo vozdeistviya (po materialam "Ashtasahasriki Pradzhyaparamity") [The Use of the Text as the Means of Psychological Influence, in Russian]—*Trudy po znakovym sistemam* [Works on Semiotics]. Vol. 20.—*Acta et commentationes Universitatis Tartuensis*, Issue No. 746. Tartu, 1987, pp. 30-38.
- Dharma kak tekst i tekstoporozhdayushchii mekhanizm [Dharma as Text and the Text-generating Mechanism, in Russian]—*Trudy po znakovym sistemam* [Works on Semiotics]. Vol. 21.—*Acta et commentationes Universitatis Tartuensis*, Issue No. 754. Tartu, 1987, pp. 22-25.
- Shunyata v semioticheskoi modeli dharmy [Śūnyatā in the Semiotical Model of Dharma]—*Trudy po znakovym sistemam* [Works on Semiotics]. Vol. 22.—*Acta et commentationes Universitatis Tartuensis*, Issue No. 831. Tartu, 1988, pp.52-58.
- 1, ∞ i 0 kak generatory tekstov i kak sostoyaniya soznaniya [1, ∞ and 0 as Generators of Texts an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in Russian]—*Trudy po znakovym sistemam* [Works on Semiotics]. Vol. 23.—*Acta et commentationes Universitatis Tartuensis*, Issue No 855. Tartu, 1989, pp. 151-152.
- Kul'turnaya model' Tibeta [The Cultural Model of Tibet, in Russian]—*Atlas tibetskoj mediciny* [Atlas of Ti-

betan Medicine]. Moskva: Galart, 1994, pp. 5-14 (re-print 1998) .

The Role of Form and Content i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exts of Classical Oriental Thought. — *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Oriental Texts. The Second Nordic-Baltic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Tartu, May 19-24, 1994. Abstracts of Papers.* Tartu: Estonian Oriental Society, 1994, pp. 25-27.

Nulli ja Jüpmatuse kohal [Above the Zero and Infinity, in Estonian]. Tartu: Ilmamaa, 1998, 392 pp.

On the Concept of Humanistic Base Texts. — *Sign System Studies*, 2000, 28, 290-298.

Andres Herkel

Pratīyasamutpāda ehk sültuvuslik tekkimine [*Pratīyasamutpāda* or the Dependent Origination, in Estonian]. — *Akadeemia*, 4, 1994, lk 533-570.

Two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Composition of Buddhist Sutras: Formalization and Antitheticality. — *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Oriental Texts. The Second Nordic-Baltic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Tartu, May 19-24, 1994. Abstracts of Papers.* Tartu: Estonian Oriental Society, 1994, pp. 10-12.

Maret Kark

Terms and Symbols in the Saraha's "Mahāmudrā tatvopadeśa śikhara dohagīti". — *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Oriental Texts. The Second Nordic-Baltic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Tartu, May 19-24, 1994. Abstracts of Papers.* Tartu: Estonian Oriental Society, 1994, pp.17-18.

Dzogchen Categories of Mind, Space and Knowledge in Saraha's Mahāmudrā Texts. — *Material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ibetan Studia*, 1998.

Märt Läänemets

Some Aspects of the Term Xiao in the Earlier Confucian Texts. — *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Oriental Texts. The Second Nordic-Baltic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Tartu, May 19-24, 1994. Abstracts of Papers.* Tartu: Estonian Oriental Society, 1994, pp. 23-24.

Konfutsianism — maailma vanim humanismiüpetus / Kungfutselaisuus — maailman vanhin humanismioppi.

[Confucianism — the Most Ancient Teaching of Humanity, in Estonian and Finnish]. — *Ajalaval: kanglane ja väärtused / Ajan arvot & sankarit* [On the Scene of the Time: Heroes and Values]. Tartu-Helsinki / Helsinki — Tartto 1995, pp.171-193 / 180-201.

The Conception of Filial Piety in Early Confucian Texts. — *Religio. Revue pro Religionistiku*, 1996, 4, 2, pp. 139-148.

Lao-zi: Müüt ja inimene. ääremärkusi Daodejing'i geneesi kohta. [Lao-zi: The Myth and the Man. Some Remarks on the Genesis of Daodejing, in Estonian] — *Looming*, 1997, 9, pp. 1227-1240.

Inimliku valitseja otsingul. Meng-zi. I, A. Vestlus Liangi kuninga Huiga (artikkel ja kommenteeritud tülge klassikalisest hiina keelest). [Looking for the Human King. An article and translation from the Classical Chinese of the first part of the first book of Mencius, in Estonian] — *Tuna*. Nr. 3, 2000, pp. 89-102.

Novye svedeniya ob obstoýatel'stvah smerti O. O. Rozenberga. [Some Unknown Facts about the Death of Prof. Otto Rosenberg, in Russian] — *Buddizm Rossii* [Buddhism in Russia], Nr. 33, 2000, pp. 66-71.

Inimene ja inimlikkus. Vana-Hiinas: Konfutsius, Meng Zi, Zhuang Zi. I-IV. [The Conception of Man and Humanity in Ancient China: Confucius, Mencius and Zhuang Zi. A series of four articles, in Estonian] — *Akadeemia*, 2-5, 2001, lk 399-430, 599-638, 843-870, 1065-1094.

Budoloog Otto Rosenberg ja Eesti. [Buddhist Scholar Otto Rosenberg and Estonia, in Estonian] — *Tuna*, Nr. 1, 2001, lk 65-75.

Return to the Antiquity in the Ancient Chinese Texts. — *Endzeiterwartungen und Endzeitvorstellungen in den verschiedenen Religionen. Akten des Vierten Gemeinsamen Symposiums der Evangelisch-Theologischen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Tartu und der Deutschen Religionsgeschichtlichen Studiengesellschaft am 5. Und 6. November 1999 zu Tartu/Estland.* Herausgegeben von Manfred L. G. Dietrich. — *Forschung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Religionsgeschichte*, Band 34. Münster: Ugarit-Verlag, 2001, pp. 113-121.